

忆读

汪曾祺
苏北 著





忆·读汪曾祺

YI · DU WANG ZENGQI

苏北 著

谨以此书纪念汪曾祺先生逝世十五周年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忆·读汪曾祺/苏北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396-4037-2

I. ①忆… II. ①苏… III. ①汪曾祺(1920~1997)
—回忆录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3598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宋潇婧

策 划:朱寒冬
封面绘图: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4456946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5 字数:240 千字

版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代序

——也说曾祺

黄蒙

苏北老兄：

得《温暖的汪曾祺》^①一册，漫读一过，颇有所感。曾祺弃世十年矣。还有人记得他，为他编纪念文集，这使我感到温暖。也许我的感觉不对，今天记得曾祺的人正多，只是未见诸文字、行动，年来闭户索居，耳目闭塞，为我所未见、未知。总之，曾祺身后并不寂寞，他的作品留下的影响，依然绵绵无尽，这是肯定无疑的。

先说他的作品。除了流誉众口的《受戒》等两个短篇，我的感觉，足以称为杰作的是《异秉》（改本），能撼动人心的是《黄油烙饼》和《寂寞和温暖》，这两篇都含有“夫子自道”的成分。《七里茶坊》也好，但采取的是旁观态势。最晚的力作则是《安乐居》。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力气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说来颇有意思，我也曾对金冬心发生过兴趣，编过一本《金冬心事

① 即本书，后改为现在的名字。——编者注

辑》，从雍乾间冬心朋辈的诗文集中辑取素材，原想写一篇清前期扬州盐商、文士、画人之间关系的文章，一直未下笔，见曾祺的小说，未免激赏。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撷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不能归入“力作”。

但从此又引出另一有趣话题。有论者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说，汪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后一位作家。我翻过他的《全集》，并未发现他有一两篇文言作品，但为何会给人留下如此印象？这就不能不从他的语言运用、文字风格去找原因。是他的语言文字给读者留下了浓郁而飘浮的特异气氛的结果。

“……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这是曾祺笔下的一节文字。偶然相遇，不禁有奇异的生疏而兼熟悉之感。这岂非六朝小赋中的一联？写出了环境、气氛，既鲜明又经济，只用了八个字，以少许胜多许，而且读来有音节、韵律之美，真是非常有力的手法。平视当代作者，没有谁如此写景抒情。这是最后一位士大夫么？是“文言文”么？

回忆1947年前后在一起的日子。在巴金家里，他实在是非常“老实”、低调的。他对巴老是尊重的（曾祺第一本小说，是巴金给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种对前辈尊敬的态度。只有到了咖啡馆中，才恢复了海阔天空、放言无忌的姿态。月旦人物，口无遮拦。这才是真实的汪曾祺。当然，我们（还有黄永玉）有时会有争论，而且颇激烈，但总是快活的、满足的。我写过一篇《跋永玉书一通》，深以他俩交往浸疏为憾，是对可惜两个聪明脑壳失去碰撞机会，未

能随时产生“火花”而言。是不是曾祺入了“样板团”、上了天安门，形格势禁，才产生了变化？我不得而知。曾祺的孩子汪朗虽有所解说，但那是新时期的后话了。

不能不联想到沈公（从文）。

从《沈从文全集》的通信部分看，他是写过不少信件，包括对公私各方面，对他的工作、处境，有说不尽的牢骚，充分诉说了生命受过的重重挤压。但在1962年顷，当局面多少有些宽松之际，他以政协委员身份得到外出视察的机会时，久被压抑的心情得到弛放，他写起诗来，对同游的委员们也不无讥嘲。我当时向他索得几页诗稿，在报上发表了，让他在久离文坛后与读者有个见面机会。诗稿是用毛笔蘸蓝墨水写在红格账簿纸上，一色漂亮的章草。诗见报后从文即来信，索回原稿，他的理由是：“旧体诗刊载过多，对年轻人无多意思。”“拙诗最好莫再分割刊载，因为如此一来，对读者无多意义，对作者亦只能留下一种填篇幅痛苦不好受印象。”坚持索回原稿。来信至再至三，而且越来越“严肃”，使我十分恼火，曾向永玉诉说：“沈公是怎么啦？”永玉说，随他去吧，老毛病啦。于是手稿至今仍压在手底。沈公写的是五言排律，也许是读了周作人在老虎桥所写的《往昔》组诗而引起了诗兴，不知可的确。

上世纪50年代，我有两次与曾祺同游。一次是随团去香港访问，不知曾祺是否曾被邀作报告，我是有过经验的。推辞不掉，被邵燕祥押赴会场（燕祥兄与陆文夫似同为领队）。并非我不喜说话，实在是觉得那种在会场上发言没有什么意思。又一次与曾祺同游，一起还有林斤澜、叶兆言负责照管我们的生活，从扬州直到常州、

无锡，碰到高晓声、叶至诚。一路上每逢参观院校，必有大会。曾祺兴致甚高，喜作报告，会后请留“墨宝”，也必当仁不让，有求必应。不以为苦，而以为乐。这是他发表《受戒》后声名鹊起以后的事。

这是社会环境、个人处境的变化对作家内心有所影响而产生的后果的两个好例子。

我以《故人书简》为题写过几篇纪念曾祺的文章，差不多每篇都全录曾祺原信，以为这样做好，可以保存他的文字原貌，实在是想要删减也不易。有一封关于王昭君的抬杠信，可以见当年在酒店、咖啡馆里谈天的风景。谈天中争论是常事，事过即了，不以为意。此后曾祺没有就此议题继续谈论。我想关于王昭君，应一律以老杜“群山万壑赴荆门”为不刊之作。杜甫是贴着昭君这个活生生的人下笔，不是当做政治筹码说事的。

曾祺后来曾写过北京京剧院五大头牌的文章，写张君秋，有这样一节：

演《玉堂春》，已经化好了妆，还来四十个饺子。前面崇公道高叫一声：“苏三走动啊！”他一抹嘴，“苦哇！”就出去了，“忽听得唤苏三……”

这一节写得生香活色，但却戛然而止。要想知道他对张君秋更多的评论，那封信里有，而且是真知灼见。当年发表时本想删去此段，转而想人已不在，留下几句真话也好。从这种小事看，曾祺为

文，不是没有斟酌、考虑的。他自有他的“分寸”。

我写过一篇记沈从文的文章，开篇就说，沈是一位写文章的人，对作家这样说，岂非废话！真实的意思是，他是凭一支笔闯天下的人。其实别人何尝也不是如此。老实说，我们这一代的作者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多半是半路出家的。比起王国维、陈寅恪那一代人，哪里好比；就连王、陈的一传、再传弟子，加上横空出世的钱锺书和傅斯年从“北大”挑出“尖子”放在“史语所”里读死书、作研究的那些人，也都说不上比。曾祺是西南联大文学系的，可谓正途出身，但他在大学里到底受到多少传统训练，实在难说。像朱自清那样正规学术研究的课，曾祺不能接受，他逃课、挨批。他读书，用“随便翻翻”的方式读书，加上社会人生阅历，积累了零零碎碎的知识碎屑，要说“学问”，也是这样攒得的。我们这些人积攒知识大抵都走着同样的路，说“学问”都是谈不上的。只凭一管笔，闯入了文坛。

关于曾祺推荐我参加评选一事，你的考证不确。此信本来不想发表，因所谈皆金钱等琐事，无甚意思。日前取出重读，深感故人情重，不避烦琐，事事设想周全，不禁黯然。今仍依旧例，全录如下。

黄裳兄：

台湾《中国时报》第十二届时报文学征文奖聘我为散文的评委。有一种奖叫“推荐奖”，他们让推荐两位大陆散文作家各六至八篇，从中选定一篇。推荐奖奖金相当

多，三十万新台币。我认识的散文作家不多，想推荐宗璞和你，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宗璞的散文我即将航空快递到香港中国时报办事处。你的散文我手头没有（不知被什么人借去了）。如果你同意被推荐，我希望你自己选。要近两年发表或出版的。选出后即寄三联书店潘耀明或董秀玉，请他们电传或快递给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季季或应凤凰，嘱潘或董说是汪曾祺推荐的。你自选和我选一样，你自己选得会更准一些。时报截稿日期是八月十五日，如果由你选出后寄给我，我再寄香港就来不及了。我希望你同意。三十万新台币可折美金近万元，颇为诱人，而且颁奖时还可由时报出钱到台湾白相一趟。当然，不一定就能中奖，因为评委有十五人，推荐的包括小说、散文、诗，统统放在一起，大陆和台湾得推荐奖只两人（两岸各一人）。

你近来情况如何，想来平安。

我还好，写了些闲文，都放在抽屉里。这两天要为姜德明的《书香集》写一篇，题目暂定为“谈廉价书”。

推荐事，同意或不同意，均盼尽快给我个回信。

北京今年甚热，立秋后稍好。不过今年立秋是九点钟，是“晚秋”，据说要晒死牛的。

即候时安。

弟曾祺顿首

八月十日

如三联有你近两年的书，可由你开出篇目，由他们选出传递。（此为边注）

此事如何处理，记不起了。大约因为时间迫促，选寄为难，辜负了曾祺一番盛意。事情过去多年了，留在心底的一片温馨却一直拂拭不去。

这一次翻检旧信，又发现曾祺旧笺两通。一通是毛笔小字行书写在一张旧纸上的。时间可能最早，当作于1947年前后。

沈屯子偕友人入市听打谈者说杨文广围困柳州，城内乏粮饷，外阻援兵，蹙然诵叹不已。友拉之归，日夜念不置，曰，文广围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劝之相羊垆外，以纾其意。又忽见道上有负竹入市者，则又念曰，竹末甚锐，道上人必有受其戕者。归益忧病。家人不得计，请巫。巫曰，稽冥籍，若来世当轮回为女身，所适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忧，病转剧。友来省者慰曰，善自宽，病乃愈也。沈屯子曰，君欲吾宽，须杨文广解围，负竹者抵家，麻哈子作休书见付乃得也。夫世之多忧以自苦者，类此也夫！十月卅日拜上。

黄裳仁兄大人吟席：

仁兄去美有消息乎？想当在涮羊肉之后也。今日甚欲来一相看，乃舍妹夫来沪，少不得招待一番，明日或当陪

之去听言慧珠，遇面时则将有得聊的。或亦不去听戏，少诚恳也。则见面将聊些甚么呢，未可知也。饮酒不醉之夜，殊寡欢趣，胡扯淡，莫怪罪也。慢慢顿首。

这是一通怪信，先抄了一篇不知从什么笔记中看来的故事，有什么寓意，不清楚。想见他在致远中学的铅皮房子里，夜永，饮酒不醉，抄书，转而为的一封信。亟欲晤面，聊天，是最为期望的事。悬揣快谈的愉乐，不可掩饰。从这里可以想见我们的平居生活场景。六十年前少年伴侣的一场梦，至今飘浮在一叶旧笺上，氤氲不去。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曾祺和我分居两地，来往浸疏，甚至彼此有新作出版，也少互赠，以致别寻途径访书。1992年初得他一信。

黄裳兄：

得三联书店赵丽雅同志信，说你托她在京觅购《蒲桥集》。这书我手里还有三五本，不日当挂号寄上。作家出版社决定把这本书再版一次，三月份可出书。一本散文集，不到两年，即再版，亦是稀罕事。再版本加了一个后记，其余改动极少。你如对版本有兴趣，书出后当再奉寄一册。

徽班进京，热闹了一阵，我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一场也没有看。因为没有给我送票，我的住处离市区又远（在南郊，已属丰台区），故懒得看。在电视里看了几出，有些戏实在不叫个戏，如《定军山》、《阳平关》。

岁尾年初，瞎忙一气。一是给几个青年作家写序，成了写序专家；二是被人强逼着写一本《释迦牟尼故事》，理由很奇怪，说是“他写过小和尚”！看了几本释迦牟尼的传，和《佛本行经》及《释迦谱》，毫无创作情绪，只是得到一点佛学的极浅的知识耳。自己想做的事（如写写散文小说）不能做，被人牵着鼻子走，真是无可奈何。即候春禧！

弟曾祺顿首

一月二十八日

一封短信，内容却丰富，把他的近况都交代清楚了。他的情绪不错，言下多有“自喜”，也吐露出创作的强烈愿望。对未来的写作方向，列散文于小说之前。对人事放言批评，一如往昔。这许多都是写曾祺传（如真的有人要写）的重要参考资料。

近来偶尔读到一篇评论近当代散文的文章，作者开了一张大名单，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散文作者，每人给予简要的评论。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需要的是非凡的眼光和一颗平常心。典范之作应属鲁迅为《新文学大系》小说辑写的序言。论文也是提到汪曾祺，但未作深论，只指出其“士大夫”意味。作者也曾揭出模糊了散文与小说之间界限的现象，但归之于另一作者而非曾祺，这倒是很奇怪的。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为读者与论家注意已久，但没有深入的研究，此事大难，也只能作些浮泛的探讨，聊备一说。

1987年，曾祺在漓江出版社出了一本《自选集》，有一篇自序。这个选本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散文之外，还选了极少量的

诗。其《早春》一题，只有两句：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的绿色的呼吸。

读来使人出惊。不知这些诗是否曾发表过，这是典型的“朦胧诗”，如先为评家所见，无情棍棒怕不是先落在杜运燮头上了。

这给了我以启示，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是“诗”。

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彩闪烁，炫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的，都是“诗”，是“诗”造成的效果。

有的论客说曾祺晚年才尽，真是胡扯。他在来信中说过，写了些短文，都随手放在抽屉里。这就说明，他一直是“文思泉涌”的。作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偶有所触，或闲居，或枕上，多半放弃、遗忘了。曾祺则不，随笔记下，遂成短章，日后有闲重写，乃成全篇。曾祺晚年多有三篇成束的短篇小说，大抵就是这些放在抽屉里的东西，有的扩展成篇，有的仍然旧样，不再抻一下使之成为中篇。如人们激赏的《陈小手》，就是保存原貌不另加工的东西。这样，从“笔记”到小说的界限就迷离难辨了。这是曾祺小说的散文文化的原因之一。

我还怀疑，在曾祺留下的许多短章中，隐藏着多少提示、未得完成的作品的幼苗，可惜了，只能借用他一篇充满感情的散文的题

目：“未尽才”！

曾祺自己说过，“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又说，“有时只是一点气氛。我以为气氛即人物”。（见《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直至晚年，他也没有放弃这个创意，这就注定他的小说和散文分不开了。

曾祺又说过，他受到契诃夫、废名、阿左林的影响。契诃夫的小说，是“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的成果；废名是“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阿左林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来的戏剧性”。看他从三家的评论与所受的影响，则他自己的小说的特质，是明明白白的了。

曾祺又明确地声明过，他的短篇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这样做，是“经过苦心经营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名满天下”了，稿件杂志编辑不能不接受，换个无名的作者，不被退稿才怪！

总之，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新的境界，全是诗。有点像钱默存想打通文艺批评古今中西之间的境界一般。可惜中道殒殁，未尽其志。“未尽才”，哀哉！

我与曾祺年少相逢，得一日之欢；晚岁两地违离，形迹浸疏，心事难知，只凭老朋友的旧存印象，漫加论列，疏陋自不能免。一篇小文，断断续续写了好久，终于完稿，得报故人于地下，放下心头一桩旧债，也算是一件快事。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廿二日写毕记

目 录 CONTENTS

代序——也说曾祺

黄 裳 / 001

忆汪十记

第一记 这些片断	004
第二记 行走笔记	026
第三记 汪一文狐	040
第四记 与黄裳谈	049
第五记 再识汪老	064
第六记 高邮高邮	074
第七记 小鱼堪饱	085
第八记 沈从文说	099
第九记 温暖包围	106
第十记 人生归宿	122

读汪十记

第一记	《大淖记事》	130
第二记	《晚饭花集》	136
第三记	读《艺术家》	141
第四记	读书解暑	147
第五记	鲜活灵动	157
第六记	“贴”着人物	165
第七记	呼吸墨迹	169
第八记	盛夏读书	178
第九记	有关品质	183
第十记	别样亲切	197
附录	沪上访黄裳	204
后记	向上的力量	219

忆汪十记

小 引

汪曾祺是当代中国文坛绝无仅有的。他为人和为文的淡泊、从容和明净，倾倒了无数的读者。他生前有许多名头，最著名的莫过于“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士大夫”、“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文人”。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博学和中国气派，使他的文字源远流长。他曾希望“我悄悄地写，你悄悄地读”。汪曾祺去世后，他的书经久不衰，他也是被人提起和怀念最多的作家。这个“人间送小温”的老人，他离开我们越久，却越接近我们。他仿若并没有离去，而是还在某个地方坐着，微笑着看着我们。这个老人，他的生命不绝如缕。